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二辑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K250.6

43

2:2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哈尔滨



A853707

责任编辑：刘文新

封面设计：蒋 明

封面题字：周慧珏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9号)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铅印室印刷

开本250×1166毫米1/32 印张9 12/15 字数147,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1093·83 定价：0.80元

目 录

伊春行 (二首)

.....陈 雷 (1)

回忆烟筒山伪军迫击炮连哗变前后

.....张瑞麟 (3)

在漫漫长夜中

——记哈尔滨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

.....张瑞麟 (18)

兴安火种

.....王明贵 (50)

奇袭老钱柜

.....王 钧 (66)

踏破兴安万重山

——东北抗联第六军一九三八年西征片断

.....王明贵 王 钧 夏凤林 (77)

林涛伴我话当年

.....张 祥 (94)

国难当头，投笔从戎

.....刘铁石 (104)

智擒于九江

.....张 德 (130)

在密林中办学

.....张 德 (144)

一个学员的回忆

.....王明贵 (151)

在那艰苦的年代里

.....李 敏 (158)

徒手夺枪

.....李再德 (169)

为抢在敌前

.....于兰阁 (173)

跟随父辈逐敌寇

.....高玉林 (188)

吉星沟人民热爱抗日军

.....万 里 (195)

不当亡国奴，支援抗日军

.....郑治平 (202)

编后记

..... (212)

但書り之旨

為尋古道東國書也吾
相逢憶故人湯明何如去
流青華轉共祝王地新
重端以甘度相逢汝也戰
友如解之友同為結事情不
今の他征道美可也

清書

庚申十月

伊 春 行（二首）

为寻古道来伊春，
老兵相逢忆故人；
汤旺河水长流去，
举樽共祝天地新。

重踏故林庆相逢，
新老战友聚一庭；
回首往事情不尽，
四化征途万里行。

陈 雷

庚申十月

回忆烟筒山伪军迫击炮连 哗变前后

张瑞麟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殉国四十周年纪念日。应中共靖宇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邀请，我带领黑龙江省代表团，前往参加隆重的纪念活动。作为曾经跟随杨靖宇将军战斗过的原南满游击队的老战士，有机会参谒将军的殉国地，缅怀先烈，追思往事，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归来的途中，我特意到了阔别四十七年的磐石县烟筒山镇。那里是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同曹国安、宋占祥（又名宋铁岩）组织伪铁道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哗变的地方，旧地重游，倍感亲切，引起我许多回想，四十七年前我们发动哗变的情景，历历在目。见景思人，我对曾经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曹国安、宋占祥烈士，更加深切地怀念。

寻 找 出 路

我一九一一年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石山站镇关家窝棚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乡连年遭荒旱，生活无法维持，七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老小，逃荒到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镇。父亲和两个哥哥长年为人家作雇工，含辛茹苦劳动一年的工钱，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九岁才上学读书，好歹念了三年，因家

庭困难，不得不中途忍痛辍学，和母亲在附近菜园子做小工。我当时年仅十二岁，就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一九三一年，我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了，开始考虑个人的前途。我不甘心任人欺凌压榨，不甘心一家人永远过那种穷愁潦倒的生活，几次试图挣脱出去都失败了。这年秋天，我和本街弹棉花的失业工人郜福臣东挪西借凑了点钱，几个人合伙开了一个弹棉花的小作坊。作坊开工不到两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入我国东北，一时兵慌马乱，人心惶惶。我们弹出的棉花卖不出去，刚开张的小作坊就面临着穷途末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伪军投降了敌人，大批涌进三岔河，街里的店铺都住上了大兵。这些家伙“打粳米，骂白面”，不给就抢。再这样下去，作坊就叫他们吃黄了。于是把作坊搬到了离铁路较远、伪军也少的榆树县南大新立屯。拖到一九三二年秋天，赔得连生活也维持不了，只好“关门大吉”。几个同伙都回家过春节，就剩我一个人看守着两间空房子。

有一天，我在屋里闷坐着发愁，突然走进一个青年人，中等个，脸胖胖的，大眼睛，穿蓝布棉袍，看上去很精神。我认出他是我们对面小粮店掌柜从外地来的一个亲戚。他自我介绍说叫曹国安。他亲切地和我拉起家常，谈天说地，偶尔也说起社会形势、青年人的前途。在谈话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不抵抗，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也很同情我的困境，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第一次接触，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人很热情，关心人，又正直爽朗，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所以很愿意和他交朋友。从那以后，他经常找我闲谈，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他比我大好几岁，我就叫他大

哥。他知道很多事，懂的道理也较多。我从他那里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他们占领东北，先把东三省变成殖民地，目的是要并吞整个中国。他还以日本灭亡朝鲜为例，说明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危亡。他说，我们中国人要想不当亡国奴，就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对付侵略者。他还经常给我讲中国共产党最关心老百姓，党领导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在东北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们正在为解放东北人民而浴血奋战。他讲的这些情况，就象在我的心里打开了两扇门，心里亮堂多了。使我感到有骨气的中国人民，不会束手待毙，中国大有希望。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曹国安同志原名叫于德俊，是吉林省永吉县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本侵略东北后，组织上把他派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在我和曹国安同志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很深，相信他，觉得跟他走、听他的话准没错。我决心参加革命，投身于抗日斗争，他就介绍我参加了新立屯的抗日救国会。曹国安同志是我政治上启蒙的老师。在他的指引下，我才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打 入 伪 军

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一天，曹国安突然提出要我和他一块去参加伪军，并说已打听到驻防在吉林省舒兰县乌拉街的伪军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我一听很不高兴，心想：那些伪军没有一点骨气，手拿着武器，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不但不抗日，反而投降日寇，为日寇效劳。我对他们厌恶极了。我说：“咱们再没事干，也不能去当汉奸兵，干那种亡国奴的差

事。”曹国安听了后笑了起来，他耐心地给我作解释说：“我们去当兵不是真的去为敌人卖命，是为深入到敌营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伪军里也有不少有爱国思想、反对日本侵略的人。我们进去把这些士兵争取过来，等时机成熟，连人带枪一起哗变出来，就变成我们的队伍了。”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就回答他说：

“要是那样还行，曹大哥，我听你的，你走到那我跟到那。”曹国安见我思想通了，就又把打听到的情况告诉我：这个迫击炮连过去是东北军驻在长春南岭的炮兵部队的一部分，“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不愿向日军投降，曾提出要抗日，后因势单力弱，被吉林的大汉奸熙洽收编，并派汉奸吉兴的外甥赵某任连长。从此，这个部队就成了为日本人效劳的工具。他还说有爱国心的士兵不会甘心跟他们走，只要多对他们进行反帝爱国思想教育，一定能争取过来。

我们俩商量好后，一块去乌拉街。找到迫击炮连驻地，只见连部门上插着个招兵的小旗，进进出出的人不少。到了报名处，一个当官的问了我俩的姓名、年龄和文化程度，说要当兵得有“保人”。这下子把我们难住了，这里没有熟人，上那去找“保人”？我们正在为难，真是巧极了，一个当兵的走了进来见到我说：“三哥，你到这里来干啥？”我听有人叫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在三岔河时姓卢的邻居。我看见他真是喜出望外，心想眼前正缺熟人担保，来得正好！我问他：“卢老兄，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了？”他说这年头兵慌马乱，在家也没事干，还不如出来当兵混碗饭吃。我拉着曹国安对他说：“这是我的朋友。没法子，也想混碗饭吃。”我又告诉他没有保人不收。他一听很痛快地对我说：“你们愿意当兵好办，我就在迫击炮连第一排当兵，

我给你们担保。”他说着就走进屋去，给我们报上了名。当即将我编到一排，曹国安编到第三排，我们俩都是当一等兵。我们就这样打入了迫击炮连，完成了预定计划的第一步。

秘 密 串 连

我们第一排的排长名叫白连柱，是原东北军的炮师团的老炮兵。据说他是迫击炮连唯一懂炮科技术的，但他不识字，连个报表也写不了。他发现我有点文化很高兴，经常叫我帮助他填个报表，写点简单的文字材料，如每个月枪枝弹药损坏、丢失的数目表报、领饷记账等。有时上边来个公文、口令等，也让我念给他听。

这个连对士兵的管理并不十分严，我和曹国安同志差不多每天都能见面。他抓住一切机会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给我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的革命斗争等等。我听他讲的多了，革命道理知道的也多了，思想认识也随着有了很大提高。我向曹国安提出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他回答我说：“只要做好工作，将来是会找到党组织的。”他叫我在一排多团结一些人，和他们建立思想感情，在士兵中建立起威信，取得大家的信任，同时注意掌握每个人的家庭历史、思想动态。对那些有反日爱国思想的人，多进行思想教育，团结他们，把可靠的人先争取过来。我在一排工作得很顺利，了解到士兵们都没有文化，不识字，有些人就是为了混饭吃，没什么政治头脑。也有些老兵，有反日情绪，不愿给鬼子干事。我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地积极地进行争取工作。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谁有什么困难都帮助。我还帮

助他们写家信、替他们站岗，说服他们改变随便打人、骂人、拿人家东西等坏作风。弟兄们看我很正派、关心人，有什么事都愿意跟我说。虽然有些人年龄比我大，但却都把我当成了老大哥。我把在排里的活动情况经常向曹国安同志汇报。他不断地帮我分析情况，告诉我该怎样做。三排的李排长也没文化，曹国安在三排同样受到器重。他的工作能力很强，把三排的多数人都团结起来了。

二月间，伪十四团全团移防到吉林省城，我们迫击炮连也一同移防，驻在原东北军的“东大营”。这时曹国安和我研究，为了好和更多的人接触，避免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决定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家也容易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我在一排活动，他在三排活动，一共联络了二十多个可靠的人。有一天我们事先约好，利用早饭前的时间，来到江沿的一个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绝不出卖朋友。然后，按年龄大小排行，曹国安岁数最大，弟兄们就一致称他为老大哥。曹国安以“大哥”的身份讲了话，主要是讲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正蹂躏着我们可爱的祖国，在这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不作奴隶，不当牛马，解放全中国，挽救全民族，大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要互相帮助。为了使大家放心，他说我当大哥的不会把你们领到坏路上去。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更加尊重他。他还注意对骨干分子进行爱国思想教育，经常讲历史上民族英雄反抗外侮的故事，如岳飞抗金等等，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出路和光明前途。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一致对外，对他这些讲话，大家都默默响应。

后来，曹国安又对我说，现在迫击炮连有我们两人工作是没有什麼大问题了，可是考虑将来哗变，有机枪连配合就更有利了，再说，将来哗变出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机关枪比迫击炮还重要。于是决定由他出去再找一个人来，补进机关枪连。他向排长请假没有准，就直接给连长写了一个请假条。连长一看假条的语句和文字写的都很好，断定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就把他找到连部，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什么职业。曹国安就告诉连长说念过几年私塾、在中药铺当过学徒，还当过中医。连长听了很高兴，正好连部缺个“贴写”（即文书），就准了他的假，叫他“探亲”回来就到连部工作。曹国安暗自高兴，这样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几天以后，曹国安领回一个叫宋占祥（后改名宋铁岩）的人，把他安排住在旅馆里，然后曹找我说：“宋占祥是自己的人。你和白排长关系较好，对他说宋占祥是你的表兄，让他给介绍到机关枪连去当兵。”我对白排长一说他就答应了。但不巧，这时机关枪连正在整编精减人，不招新兵。白排长知道这情况后对我说：“当兵在那还不行，非得去机关枪连？就把你表兄补在迫击炮连吧。”当时因为一、三排有我和曹国安给排长当帮手，排长很满意。只有二排缺少一个有文化的，二排长曾向白排长说过，要他帮助找一个有文化的新兵。为此白排长曾向我打听：“你表兄有文化没有？”我说不仅有文化，比我还高呢。这样就把宋占祥编到了二排。从此，迫击炮连三个排都有了我们的人。我们三个经常按照规定的时间见面，交换情况，研究问题，工作开展的很顺利。

过了不久，迫击炮连也开始整编，几个有明显反日情绪的士

兵被开除了，一时弄得人心惶惶。我们几个就借这个机会进行反日宣传。我暗中对几个可靠的人说：“日本人不相信咱们，你们过去抗过日，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部缴械。”士兵们听了对日本人更加仇恨，表示不愿意干了，要拉出去当土匪。这时曹国安又告诉我，现在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能轻举妄动，要进一步做思想工作，劝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等待时机，当土匪不是出路。如果有一天日本人真来缴械，就和他们大干一场，然后再上山也不晚。我把曹国安的意见对大家作了传达，大家的情绪才慢慢的稳定下来。

投入党的怀抱

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十四团接到命令，到吉林南山里“讨伐”抗日游击队。连长把曹国安安排在省城留守，同时照看他的老婆。出发前，曹国安嘱咐宋占祥和我：进山后要对弟兄们多作思想工作，如有机会就在战场上组织哗变，不必等他。但一定要慎重行事，并说如能和抗日游击队联系上更好，让他们知道伪军中有自己的人，以便将来配合行动。

伪军从吉林出发，坐火车沿吉海路南行，到了磐石县烟筒山车站下车，然后步行进山。山里道路崎岖，林木交错，士兵们背着枪、扛着迫击炮和炮弹箱，爬山越岭，累得精疲力尽。大家怨气冲天，背后大骂连长，骂那些当官的要中国人打中国人。部队奔波了十来天，根本就没能和南满抗日游击队接触上。后来碰上一股山林队，双方打起来，一些骨干们故意朝天放枪，不瞄准乱打炮。“讨伐”就此告终，队伍又回到烟筒山镇临时驻防。我们迫击炮连单独驻在该镇南一个私人开的“成德源”烧锅大院里。这

个烧锅院很大，南北长一百五十多米，东西宽八十多米，土院墙有一丈多高，四个角都有炮台。院里靠北面有五个很大的高粱囤子，东西两厢是烧酒房和工人宿舍，中间一排九间砖瓦房，连长住在紧西头两间柜房里。我们一排住在东厢房，二、三排住在西厢房。

我们住下来以后，我才想起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这是我到伪军以后给家写的第一封信。家里得知我的消息后，我爱人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一点钱拿出来，给我堂叔做路费，请他赶到烟筒山，劝我回家，说全家老小都想念我，只要我回去，我开棉花作坊时欠人家的外债家里都能给还上。这时我已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的组织，并在曹国安的指导下，做着组织伪军的工作，正在用实际行动接受党的考验。在我思想中前途问题已经解决了，放弃战斗岗位，回家是没有出路的。我终于把叔父说服，他答应回去再说服家人。他临回去时，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饷钱给他作了路费。曹国安对我这样做很满意并给我以鼓励。

阴历四月下旬，曹国安送连长老婆回到了连里。他回来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到院子东北角的空炮台里碰头。我和宋占祥向他详细汇报了进山后和当前的情况，一同分析了形势。一致认为：迫击炮连的士兵绝大多数厌恶伪军生活，反日情绪越来越大，如发动哗变，能拉出去的人可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能跟我们一道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烟筒山接近山林，离南满游击队较近，哗变后很容易进山与游击队会合。四月下旬，青纱帐起，树叶“关门”，自然环境对哗变也很有利。迫击炮连所驻的“成德源”烧锅大院距离本营其它部队都较远，行动方便，不受牵制。错过这个时机，一旦伪军调防离开烟筒山，进驻吉林省城或到平原地

区，这些有利条件就要失去，哗变能否成功就很值得怀疑了。经过这样分析，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组织哗变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准备付诸行动。

几天后，正是端午节前两天，即旧历五月初三的中午趁士兵们休息的时候，曹国安和宋占祥约我到大院门外东南一百米处的小苗圃散步。进到里边，见附近没人，曹国安同志严肃地对我说：“张秉文同志（我当时的名字），你要求入党的愿望实现了。根据你的要求和工作表现，党组织接受了你的要求，我和宋占祥同志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我才知道，不仅曹国安，连宋占祥也是共产党员。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脸上热乎乎的，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宋占祥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烟盒，打开一看，是用铅笔画着镰刀斧头的一面小党旗。他把“党旗”挂在树枝上，我举起左手，跟着曹国安同志宣了誓。此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从寻求生活出路走上社会，经历了种种痛苦和磨难，终于投入党的怀抱，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接受党的考验，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哗 变 成 功

在我入党的那天晚上，我们在烧锅院那个空炮台里开了第一次党员会，最后决定在端午节的午夜十二点发动哗变，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根据当时士兵们对日寇的恐惧心理，到时喊“日本人来缴械了”的鼓动口号做为发动哗变的信号。哗变后，队伍由曹国安领着过铁路到车站南边三里多路的烟筒山下集合。三门迫击炮由我们三人各自负责带走，炮弹尽量多